



关于中國現代文学

李何林著



新文藝出版社



关于中國現代文学

李何林著

新文藝出版社

一九五六·上海

关于中國現代文學

李 何 林 著

*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一五五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審查臺號

上海市印刷五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書號 1071

開本 787×1092 紙 1/32 印張 4 1/8 字數 83,000

一九五六年八月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八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10,000 定價(7) 0.36 元

前　　記

这是我在解放后寫的有关中國現代文学和近代文学的四篇文章和三次講話的記錄。

前三篇是关于五四时代的新文学的：

“近二十年中國文藝思潮論”自評一篇，一九五〇年“五四”紀念日曾在光明日报上發表，原題是五四以來中國新文学的性質和領導思想問題。当时的主要目的是在討論新文学的“領導思想”問題，以糾正我在一九三九年編寫印售，在解放后还在繼續印售的这本思潮論的錯誤。一九五〇年对于新文学的性質認為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学”，還沒意識到有社会主义現實主义的成分，尤其是对于五四时代的新文学。当时所以这样認為，由于覺得从“五四”到一九四九年我們的革命既然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化是新民主主义文化，而文学是文化的一部分，所以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学”。当然我們也可以比較具体地說：“新文学是無產階級及其思想領導的、統一戰線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資產階級的、人民大众的文学”；而这些附加語的含意又恰恰是“新民主主义的”意思。从另一方面說，新文学是反映从“五四”到一九四九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現實和本質的，所以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学”。

而除这个提法以外，近几年我們还有兩种提法：

一种是把这三十年的文学統統称之为革命民主主义的文学。这“革命民主主义”我想應該不同于俄國十九世紀的“革命民主主义作家們”的革命民主主义；因为他們所反映的“不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俄國的農民民主革命，我們的革命“是無產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所以我們的“革命民主主义的文学”，实质上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学”。新民主主义是属于社会主义范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無產階級及其先鋒隊領導的，那么，“新民主主义的文学”当然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成分。

另一种提法是就創作方法來說的：第一个十年（一九一八——一九二七）是批判的现实主义或基本上是批判的现实主义；由一九二八年到一九四二年是革命的现实主义或革命民主主义的现实主义；一九四二年以后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或說：整个三十年都是革命的现实主义或革命民主主义的现实主义。或說：一九二八年到一九四九年是革命的现实主义或革命民主主义的现实主义。这“革命”大約是“有社会主义思想領導的革命”的意思，也就是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成分的意思。或說：整个三十年都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或属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范畴的文学。

那么，对于中國新文学的性質究竟應該怎样說明？还有待于大家的研究和討論。

第四、五、六篇，是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到五四年三月在北京中央文学研究所（后改为中國作家协会文学講習所）对学员

同志們的三次講話的記錄，由我修改了的。那时正是第二次文代大会以后，學員同志們正要學習中國現代文学；要我用三个半天的時間先簡單地介紹一下新文学的發展概況。因为在第二次文代大会上，周总理、茅盾和周揚三位領導同志都指出：从五四时代起，社会主义現實主义就开始萌芽，“五四”以來的新文学的主導傾向或主流是社会主义現實主义。我当时就嘗試着用“社会主义現實主义在新文学中的萌芽、成長和發展”作为綫索，介紹了一下新文学的發展概況。因为我的理論水平低，也因为我对新文学作品和有关資料閱讀的少，我沒能比較全面地具体地闡述它的萌芽、成長和發展的情况。虽然由于時間的限制，但質的好坏并不决定于量的多少；这三次講話的內容不僅僅粗疏簡陋，錯誤也一定难免！新文学史上沒有解决的重大問題很多，急待領導上或中國作家协会組織力量研究討論；那么，我的這三篇粗疏的錯誤的講話就作为同志們研究批評的对象吧。

最后一篇是关于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文学改良运动的。五四时代的新文学是直接繼承这文学改良运动的反帝反封建（虽然沒有五四时代徹底）的現實主义的精神，一脉相承地發展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文学革命运动。舒蕪同志最近在光明日报“文学遺產”（一九五六年一月十五日）上發表一篇开展自鴉片战争到五四时期文学史的研究的文章。他認為这段文学史过去研究新文学和古典文学的人都不管，是“兩不管”的部分；他要求“这方面的研究，應該尽速展开。”我这篇是一九五四年九月寫的，發表在十月号的新建設上；也是想給

这个时期的文学画下一个輪廓。但同样由于我的理論水平低和讀的書太少，同样画了一个粗疏的甚至是可能有錯誤的輪廓！譬如，就和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出版的第十二期文史哲上陸侃如、馮沅君二先生的中國文学史稿(十八)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学比較，它所提到的作家和作品都比我的多得多，見解也比我的好。几十年來，这一段文学史确是一塊半开垦的荒地，今后古典文学的研究者們固然要“管”，新文学的研究者們也不能不“管”，因为新文学和它有一脉相承的关系。

李何林 一九五六年一月章于南开大学。

目 次

前 記	I
“近二十年中國文藝思潮論”自評.....	1
五四时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萌芽.....	10
批判胡適唯心論文学思想的几个主要方面.....	21
“五四”以來新文学發展的道路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39
左联时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成長.....	59
“在延安文藝座談会上的講話”以后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發展.....	86
从鴉片战争到“五四”的社会背景和文学概况.....	104

“近二十年中國文藝思潮論”自評

近二十年中國文藝思潮論(以下簡稱思潮論)是我自一九三八年夏天到一九三九年夏天,在四川江津縣白沙鎮編寫的;我在序的末了說:“編者僻處小鎮,參考書籍甚感困難;取材不周,論述未免失當。尚祈讀者原諒并賜指正,為幸!”這並不是照例的客套,當時我確是感覺到“論述未免失當”的;但限于當時蔣管區的環境,和自己的學識修養太差,也只能搞出那样一本東西。由于中國出版界從那時到現在這十一年期間,還沒有一本“中國新文學史”或“中國新文藝思想史”,系統的給一般讀者一個中國新文學發展的概況;這本書自从一九四〇年春由上海生活書店出版以來,遂即填上了這一個空白:上海版,香港版,桂林版,重慶版,東北版,大約印售了已經不少了。“未免失當”的“論述”,也該影響了不少的讀者。一九四八年秋我在正定華北大學國文系工作,草拟了一個近三十年中國新文學運動大綱;前二十年即大致依照思潮論的綱目,獨立於中國文學以後的十年;我的意思其實仍是新文學思想發展大綱,不是新文學運動大綱,當時匆忙間沒有把它區別開來。錢穆、何平山同志看過後,對於中國新文學的性質和五四時代新文學的領導思想問題,向我提出了不同的意見(見下),我當時雖然覺得他們說的也有理由,但並未能使我心服。以後經過了約十一年期間在華北大學的熏陶和學習,以及同志們的

帮助，尤其是和范文瀾同志的商談，才認識到他們的見解是正確的。所以在一九四九年九月，我就向華北大學國文系全体同學批評了思潮論的一些缺点，尤其是五四時代的領導思想問題。我是早該根據我現有的思想水平和諸同志的意見，批評一下思潮論的錯誤或缺点，以告罪于讀者的了，也想把全書重寫并補寫最近的十余年，但總沒有這樣的机会和可能。昨見報載北京各大學同學正在熱烈的展開討論五四運動的領導問題；光明日报社的紀念五四“筆談”征稿，也以“五四運動中的領導思想問題”為題；難道同學們中也有人以為五四運動是資產階級領導，五四時代的領導思想是資產階級思想嗎？那就和十一年前我所編寫的思潮論犯同一錯誤了。李廣田先生要我在“五四”紀念日前去清華大學向同學們作一次關於中國新文學問題的報告；一舉兩得，我就粗略的寫下這篇文章來，敬請大家指教！

一 中國新文學的性質問題

我在思潮論的序裏面說：

如以這二十年（一九一七——一九三七）文藝思想發展的“階級性”來講，實在只有兩種思想做為主要的潮流支配着這二十年的文藝界。即由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二七年是資產階級文藝思想的發展和無產階級文藝思想萌芽的時代；由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七年是無產階級文藝思想發展的時代。

問題就在於資產階級文藝思想的“發展”，和它在五四時代是不是領導思想？以及中國新文學的基本性質是什麼？雖

然在我的全書中，到处說“中國新文學是反帝反封建的文學”，“文學研究會和創造社的作者是小資產階級作家”，“一九二八年魯迅和創造社、太陽社的論爭，是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的內哄”，但我对于“五四”前后一二年反古文、文言文的斗争和提倡白話文的运动，認為是資產階級的文学运动；对其后的文学研究會的寫實主义运动及其作品，和創造社的浪漫主义运动及其作品，也認為是資產階級的文学运动和資產階級的文学样式。並沒有說：“这是在無產階級及其思想領導下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反帝反封建反買办資產階級（一九二七以后的官僚資產階級）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学运动。”虽然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論那时（一九三九）还没有發表，蔣管区的學術界还没有应用“新民主主义”这一个名詞，但我把“五四时代”（即“五四”前后一二年到一九二五年的“五卅”。）的新文学运动，当作是資產階級的文学运动，（虽然我也說过無產階級文学思想在一九二三年“二七”以后也就產生。）沒有看出从“五四”一开始，無產階級思想就在起着領導作用，資產階級的思想只支配着極少数的作家。所以，还是錢俊瑞、何干之同志說的对：

从“五四”到現在，中國的新文学乃是以無產階級文学思想为領導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学，亦即新民主主义的文学。它不是帝國主义文学和封建文学，这是很顯然的，因为这二者恰是新文学的敌人。它也決不是一般的資產階級文学；只是当作它的構成部分，它包含着一部分具有民族独立思想和反封建思想的資產階級文学，而这个中國的資產階級文学（不是翻譯），在新文学陣地上所占的比重和地位是每况愈下了。它也不是無產階級的社会主义

文学，因为它并不一般地反映社会主义的政治經濟生活（当然，苏联作品的介紹对中國新文学發展的方向和繼續前進，起了極其巨大的作用）。我們的新文学就其內容和作者所代表的社会階層來說，都是一个统一战綫的（即包含有無產階級的，小資產階級的和資產階級的思想及其作家）反帝反封建的人民民主主义的文学。这就是我們的新文学的基本性質。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八日錢俊瑞致何干之、
陈唯实、李何林、尚錢的信。

近三十年文学运动，第一个十年，你用‘資產階級的文学运动’來表示。第一个十年中著名的作家有魯迅、郭沫若、郁达夫等，魯迅的作品如阿Q正傳、狂人日記等，顯然是急進民主主义者的作品。魯迅曾說他的小說是遵奉‘革命前驅者’的命令而寫的，其思想本質，則是共產主义的。郭沫若的詩如女神、星空，劇作如三個叛逆的女性等，顯然也是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的反抗的作品；至于他的創作方法，不是一般的浪漫主义，而是革命的浪漫主义。成仿吾的批評也屬於这一类。郁达夫的頽廢作品，則代表小資產階級的另一派，但也可以算是反抗的——消極的反抗。并且魯迅自一九二八年后即走上馬克思主义的道路，而郭、成等在“五四”后期即受了馬列主义的影响而逐漸轉变。（思潮論對此沒有看錯——何林。）这是急進民主主义者發展的道路，否則把他們都列入資產階級的范畴，新文学史就不可解了。

——一九四八年十月何干之致李何林信。

我当时的看法是：五四运动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間乘機發展起來的中國民族資本主义的資產階級的反帝反封建运动；五四时代的新文化运动也是以資產階級思想占优势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在蔣管区的進步文化界有这种看法

的人很多。一九三七年左右出版的何干之同志的近代中國啓蒙運動史也是这种看法。) 所有在新青年、新潮、每周評論、學燈、覺悟、晨報副刊、改造、少年中國等等雜志和副刊上發表反帝反封建文章的人，十分之九运用的是資產階級的“科學”和“民主”的兩大思想武器，只有李大釗、毛澤東、恽代英等極少數的人，才具有初步的馬列主義的觀點。因此对于“五四時代”的新文学运动，我也就順理成章地認為：“五四前后一二年反古文、文言文的斗争和白話文的提倡，是資產階級的文学运动；五四时代后期的文学研究会的为社会为人生而藝術的寫实主义运动，和創造社的為藝術而藝術的浪漫主义运动，也是歐美十八九世紀資產階級的文藝思潮和文学样式在中國的重演。这两个团体的作家虽然多半是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但他們的政治社会思想和文藝思想，則是資產階級的。”而沒有看出來：五四时代的新文化运动，在思想的“量”上虽然好似資產階級的“科學”和“民主”占着优势，但是作为一个新生事物的新兴無產階級的思想，在“質”一方面实在起着領導的作用。尤其是在十月革命影响之下發生的“五四”新文学运动，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在世界範圍內業已日趨沒落的資產階級思想，是不能起領導作用的。也沒有看出來“反古文、文言文的斗争和白話文的提倡”虽然是資產階級“性”的文学运动，但是是在無形之中被無產階級思想所引導或影响的小資產階級和一小部分資產階級的文学斗争，資產階級的工作是其中最弱的一环。也沒有看出文学研究会的寫实主义和創造社的浪漫主义，从形式上看來虽然是歐美資產階級文学运动的重演，但他們的思想和作品基本上并不同于歐美資產階級的作家。

五四时代(及其以后)的中國新文學，是在無產階級思想領導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反買办資產階級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学，不是在資本主义國家內受資產階級思想支配的資產階級的單純反封建的文学。

二 中國新文学的領導思想問題

思潮論对于“五四”以來無產階級文藝思想的發生和發展，以至一九二八年以后在中國文藝思想界占着絕對的优势，作为領導思想战胜了一切，支配了一切的情形，是論述了的。

不过郭沫若的我們的文藝新运动和郁达夫的文学上的階級斗争之所以均發表于一九二三年五月，很顯然的在說明文学上的劳动階級意識的反映，是以其在前三个月就爆發了的“二七运动”为背景的。二七运动是中國工人第一次轟轟烈烈的大运动，在反封建軍閥斗争上顯示了他們的社会的力量。以后在五卅，在北伐，他們的力量就愈益强大起來了。因而劳动階級的文学意識，(即無產階級的文学思想)也就由萌芽而生長、成熟、終於在一九二八年以后作为中國文藝思想界的主導勢力而發展下去。(思潮論第一一四頁)

所以，思潮論的錯誤，并不是它沒有看出自“五四”以來無產階級文藝思想的發生和發展，而在它把这种思想延迟到一九二八年以后才認為是中國文藝思想界的“主導力量”，沒有指出來从“五四”起就是領導思想了。

錢俊瑞同志說：

关于誰是新文学的領導者問題，毛主席在其新民主主义論中

就明确的指明：“在五四以前，中國的新文化运动（包括新文学运动在內——錢），中國的文化革命，是資產階級領導的，它們還有領導作用。在五四以后，这个階級的文化思想，却比較它的政治上的东西还要落后，就絕無領導作用；至多在革命时期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一个盟員，至于盟長的資格，就不得不落在無產階級文化思想的肩上。这是鐵一般的規律，誰也否認不了的。”这主要是由于：一、世界已進到帝國主义时期，特別是十月革命的勝利；二、中國資產階級的軟弱和無產階級的兴起，这些基本条件所決定的。“五四运动，在其开始，是共產主義的知識分子，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与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他們是当时的右翼）三部分人的統一戰綫运动。”同时，这个“五四运动是在当时世界革命号召之下，是在俄國革命号召之下，是在列寧号召之下發生的。”因此，我們應該肯定：五四运动这一統一戰綫的革命运动的主要領導思想是無產階級的共產主义思想。从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到北伐戰爭，这个包括三个階級，即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統一戰綫，在政治上达到了國共合作，在軍事上進行了北伐戰爭，在文化上則共同進行了反帝反封建（反对尊孔、讀經、反对旧文学、文言文、反迷信）的宣傳教育。在这一时期，無產階級思想之作为革命运动的主要領導思想，就更加明顯与确定了。以后，从一九二七到三六年的內战时期，从三七年到四五年的抗战时期，以及从四六年到現在的人民解放戰爭时期，無產階級思想对整个文化領域的領導，則是一个时期比一个时期地更加突出，巩固，擴大（指被領導的对象和領域而言），并走向日益健全和完备的地步。現在中國文化的領域內，只剩下一大部分自然科学的陣地，我們還沒有來得及和還沒有足够的力量去占領它；其他的陣地，則不僅已被我們占領，而且早已被我們利用了作为進攻敌人的强大陣地了。这在文学和社会科学部門表現得最为明顯。这就是我們对于無產階級思想在新文

學运动中的領導地位看法。(前引之信)

何干之同志說：

資產階級的文学思想，只是五四文学思想的一种，并且不是重要的一种；而李大釗、陳獨秀等早年就有共產主义思想，而这种思想才是那时代的領導思想。你看这看法如何？第二个和第三个十年，你用“無產階級文学思想”來表示，这作为一种文学方法或創作方法來講，是不錯的；但文学运动的性質，則是反帝反封建的，即是屬於新民主主义的文学范疇，（最初十年也是如此）这一点不能够含糊，只是反对誰联合誰等問題有所不同而已。（前引致李何林信）

范文瀾同志給我的信里說：

一、五四运动是在十月革命以后才發生的，新民主主义論第十三節講得很清楚。所以，从五四运动作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看來，它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运动所影响的，也可以說是世界無產階級所領導的。

二、五四运动是三部分人的統一戰綫的（新民主主义論第十三節）革命运动，当然不容否認小資產階級与資產階級的作用。共產主义的知識分子——無產階級思想，在这个运动中虽然数量比較小，質量却比較高，是最先進的，最能动员廣大革命群众的一种思想。所以，这种思想在这个統一戰綫中是处于主導地位的。这是从發展的一方面着眼所得的結論。

范信中末了一段：“無產階級思想在这个运动中虽然数量比較小，質量却比較高，……这是从發展的一方面着眼所得的結論。”对于我的說服力最大。我在蔣管区虽然也看过一点辯証唯物主义的書，記了一些書本上的法則或教条，但不能运用于实际，遂把一个衰老沒落的似乎量大的事物（資產階級思想）遮蓋了新生的發展着的量虽小而質高的事物（無產階級思

想)的領導作用。

我說“似乎量大”，意思就是“其实量也并不大”；因为我“現在”認為：李大釗先生固不用說，其他如魯迅、沈雁冰、郭沫若等等，他們在五四時代假使所接受的僅僅是在世界範圍內日趨沒落反動的資產階級思想的影響，而沒有在無形之中（他們不自覺的）被無產階級思想所感染，所引導，那麼，他們就不可能在“五四”前后所發表的文章里面，那样激烈的向封建文化思想和文學進行鬥爭。以先天不足，后天又不良的軟弱的中國資產階級作為社會基礎的代言人、是不可能在二十世紀一、二十年代向封建勢力進行那樣的鬥爭的。文章俱在，大家翻出來看一看就可以了。

思潮論對於抗戰前二十年中國新文學的性質，沒有明確的指出從開始到末了都是統一戰線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義的文學。對於五四時代的領導思想問題，又認為是資產階級思想占優勢，沒有看見無產階級思想從開始就在領導着了。以上二者不過是思潮論兩個大的方面的缺點或錯誤，其他大的小的錯誤或缺點還很多，以我現在的能力和時間都不可能一一的把它們寫出來。我只希望有機會把那本書全部重寫一下，并加上最近的十余年；或者請全國文聯來作這個工作，這是極需要作的工作！

一九五〇年五月二日于中央教育部